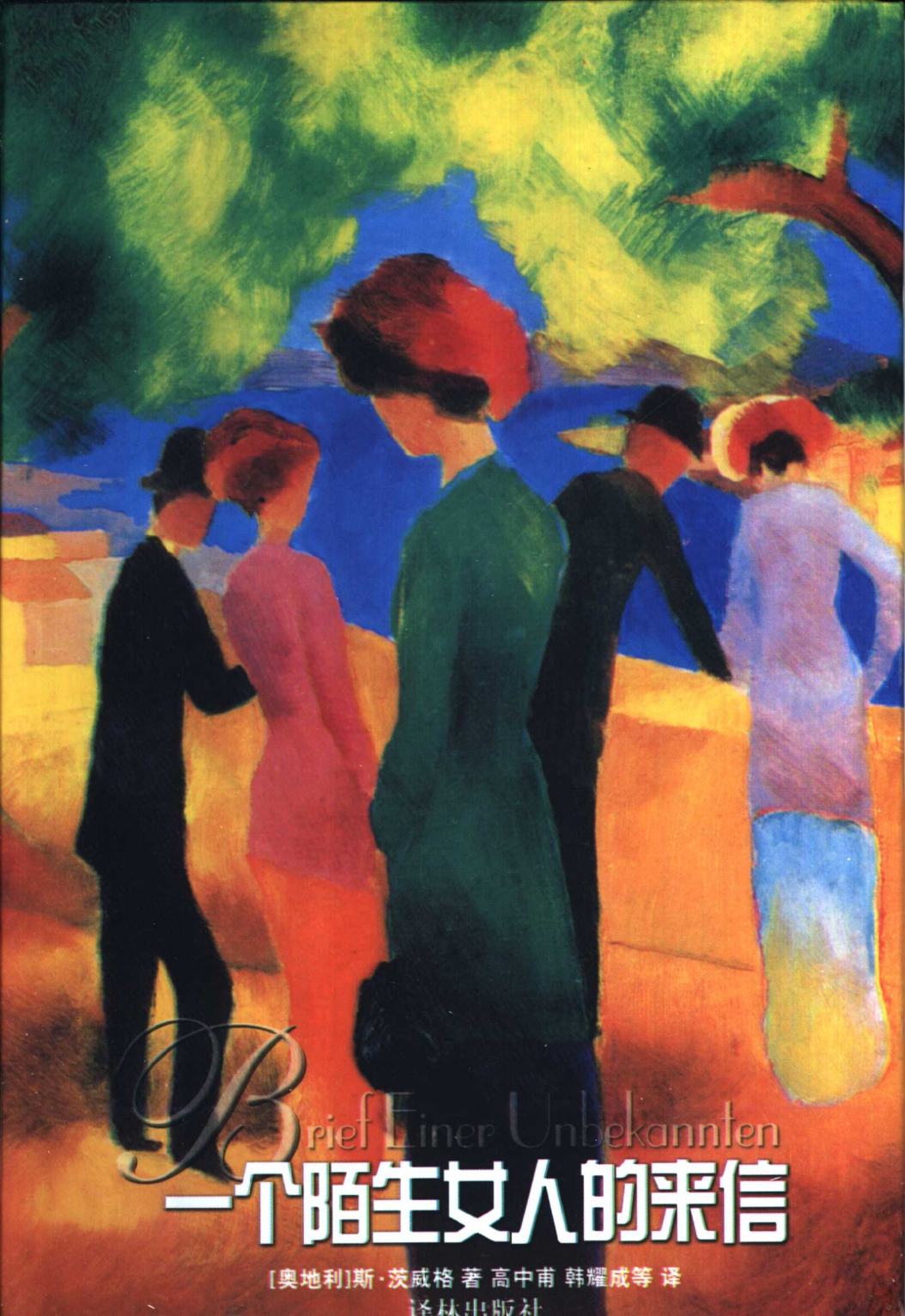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斯·茨威格 著 高中甫 韩耀成等 译

译林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 斯·茨威格 著 高中甫 韩耀成等 译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地利)茨威格(Zweig, S.)著;高中甫编选,高中甫,韩耀成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0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ISBN 7-80567-712-3

I. 一... II. ①茨... ②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0413 号

书 名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作 者	[奥地利]斯·茨威格
编 选	高中甫
译 者	高中甫 韩耀成等
组稿编辑	赵燮生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原文出版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刷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 页	4
字 数	316 千
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712-3/I·410
定 价	(精装本)17.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一八八一年，斯·茨威格生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父亲莫里茨·茨威格是摩拉维亚的犹太人，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开办了一家织布厂；母亲伊达·布莱陶尔出生于一个犹太银行世家。家道逐渐殷实富有后，他们迁居维也纳；随着事业的发展 and 经营的得法，到莫里茨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使斯·茨威格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也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他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

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不仅是奥匈帝国的首善之区，也是欧洲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如茨威格所称，“维也纳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综合”。E. 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弗·布伦塔诺的意向本质学说（他的弟子埃·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即源于此），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古·马勒、里·施特劳斯在音乐上取得的世界性声誉，造型艺术上的分离派对欧洲的影响，而在文学上则是“青年维也纳”的崛起。这一切使文化古城维也纳焕发出新的光彩，标志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奥地利的历史学家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奥地利二十世纪的开始，随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必将旧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标准的嬗变。“青年维也纳”正是文学领域里应运而生的一种新思潮的代表者，它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无形但又实际存在的文学团体，有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青年德意志”一样。著名的批评家赫尔曼·巴尔是它的发起者和代言人，阿·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阿尔

滕伯格、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等人是它的重要成员。这群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现代青年人追求的不再是父辈们钟爱和尊敬的一切,他们不再唯柏林和慕尼黑马首是瞻,而是要赋予奥地利文学一种新的面貌,用巴尔的话来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这样一种愿望:给奥地利一种具欧洲地位的文学”。

斯·茨威格的文学意识和艺术情趣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学思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走向了文学之路,并成功地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在自传《昨天的世界》里他不无骄傲,也不无夸张地说,他在价值判断和文字表达能力上已超过了那些著名的评论家。一八九八年,十七岁的茨威格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一九〇〇年他进入大学时已有两百多首诗歌问世。

十九岁的茨威格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一九〇二年转入柏林大学。他并不喜欢抽象的纯思维的哲学,他之所以选择了它,是因为学这门课最容易混。对于茨威格来说,大学是一个上学而不上课的自由时代。在《昨天的世界》中他写道:“我在那里(指柏林大学)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到学校去两次,一次是为了听课注册,另一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求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种更彻底的自由。”他利用这种自由来从事他所热衷的文学活动。进入大学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学时代发表的诗歌结集出版。一九〇一年他的第一本诗集《银弦集》出版,内收50余首诗歌。除了诗歌,他也开始写小说和评论,一九〇二年,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刊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出游》,这是取材于《圣经》的一个短篇。他虽然小有名气,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功力不足时,欣然接受了诗人、作家戴默尔的忠告,去从事文学翻译,从外国作家那里汲取营养。他很快便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成就,一九〇二年出版了《波德莱尔诗文集》,编选了《凡尔哈伦诗歌集》(1902)。还在大学时期,茨威格就专程去比利时拜访了他尊敬的这位比利时诗人,同他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为了把被誉为欧洲的惠特曼的凡尔哈伦(1855—1916)介绍给德国读者,

他不仅自己,而且争取到像戴默尔、黑塞这样的著名诗人翻译凡尔哈伦的诗歌。他还写了凡尔哈伦的传记,称他是自己青年时代之星。此后,茨威格把介绍欧洲作家,也包括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在内的工作看做是他的一项道德任务,担当起一个非常积极的中介者的角色。他自称是一个欧洲人,他把欧洲当代的和历史的许多人物——主要是作家——都纳入他的笔下,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如著名的作家传记《世界建筑师》,还要特别提及的是,在一九一九年茨威格竭力向著名的岛屿出版社的出版人安东·吉彭伯格建议,为德国读者出一套世界文学书库,而且要出三种形式的:原文版、德文版、两种文字对照版。托马斯·曼在谈及茨威格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茨威格的为人,在涉及他作为一个文化中介者所作出的贡献时写道:“传播是他的心灵的事业,他把他生命的一半都用来去翻译,去宣传,去服务,去帮助。”

一九〇四年,茨威格大学毕业,以题为《泰纳的哲学》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的生涯。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他相继发表了小说、诗歌、戏剧和翻译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出版于一九〇四年,内收四篇小说:《雪中》、《出游》、《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和《生命的奇迹》。一九〇六年他的第二部诗集《早年的花环》问世。他的第一部诗剧《泰西特斯》发表于一九〇七年,翌年在德累斯顿等地上演;另一部独幕剧《变换不定的喜剧演员》(1912)和悲剧《滨海之宅》(1911)也都先后上演。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专著《魏兰》(1905)、《艾米尔·瓦尔哈伦》(1910)以及评论等。这些作品为茨威格在文坛上取得了立足之地,有些也得到了好评,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从整体上看,它们还不够成熟,缺少自己的风格,只是为他此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茨威格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回顾青年时代的创作时,做了这样的苛评:“虽然我很早(几乎有点不大合适)就发表作品,但我心中有数,直到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

一九一一年，茨威格的第二本小说集《初次经历》出版了，这是他第一本引起反响的作品。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尔指出：“这个集子中的小说才使他开始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list)。”这本小说集有一个副标题：儿童国度里的四篇故事，收有《朦胧夜的故事》、《家庭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这几篇小说用青春萌发期的儿童视角去观察为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儿童迷惘而又躁动不安的心态。《初次的经历》确立了他在德语文学界中的地位，表明了他正在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展示了他在创作上的追求和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去探索去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调，他把这部小说集称为他“链条小说”最初的一部。弗里顿塔尔在谈及他的这几篇早期小说创作上的特点时指出：他怀着热情，带有精神医生进行治疗时的谨慎和谅解。这部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式表明了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对他的影响，虽然这仅仅还是开始。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剧烈的“地震”把他抛掷到一种与过去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去了。在艺术上敏感而在政治上却显得迟钝的茨威格，处于动乱中心的奥地利，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还觉得世界“美丽而又合乎情理”。现在整个奥地利被一种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狂热所左右，整个欧洲陷入一场民族间的仇杀之中。战争才使他对时代开始较为密切地加以关注，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字句：“这是我整个生活中最可怕的一天。”虽然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茨威格就从内心作出决定，做一个欧洲人，但他在一段短时间里却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陷入迷惘和矛盾之中，并且还写了些热情的文章。一九一四年他自愿服役，在战争档案处和战争新闻本部工作。战争的残酷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这促使他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四日发表了他的那封语调低沉的和平主义的《致外国友人的信》。但是直到一九一六年初，如他在《昨天的世界》中所说的，他才成了一个反战主义者。

这场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变化,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战争之前,茨威格是一个超党派之上的文化人,他称自己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不问政治,也很少关心现实问题,不仅在生活中如此,在他的作品之中也表现出来。他以前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很少触及敏感的时代问题,很少表现出一种批判精神。现在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间的杀戮,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必然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一九一六年,还在战争期间,他创作了戏剧《耶利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这部剧本的。这是取材《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书》而创作的一部诗剧,写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巨大灾难,但无人听信;在狂热的时刻,这位先知被当做是傻瓜和叛徒,在失败的时刻,他证明自己是一个能战胜失败的人,他把自己看做是主的一个卑微工具,“用我的肉体去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去维护和平”。在这位先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本人的影子。

除了这部《耶利米》之外,茨威格还写了一些文章,如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七月的《信奉失败主义》,以及一九一八年夏天创作的小说《桎梏》,在这些著作里他表明了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和平的热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一八年以德奥的失败而结束。茨威格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某些东西,可他获得的更多。一九二六年,他在一篇题为《匆忙的镜中一瞥》的文章中作了这样一份总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的东西,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烈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的多年时光之后,突然间成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

茨威格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增强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感,热衷做人类心灵的猎者,因此,战后到一九三三年这段时间成为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完

成了由三本书组成的《世界建筑师》：《三位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位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斯汤达、托尔斯泰）。在这些传记，或者说作家散论中，茨威格以多彩生动的文笔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这些作家的生平，而且展示出这些大师栩栩如生的独特性格和复杂而幽暗的精神世界。一九二八年，他在《三位作家的生平》的导言中谈到了他创作《世界建筑师》的意图：“《与魔的搏斗》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表现为被魔力驱动的悲剧气质的人的三种变化形态。这种气质既超越自身，也超越现实世界，抗拒着无限的东西。《三位大师》则是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成是叙事文学世界创造者的典型。他们在自己长篇小说的宇宙里建立起了与现有的真实并存的第二个真实。《三位作家的生平》之路既不同于第二卷里写作家进入无限的事物中，也不同于第一本的那样进入现实世界，而且完全退回到作家本身。这三位作家都无意识地认为，自己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摹写宏观世界，不是去摹写丰富多彩的现实存在，而是把自我的微观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这部《世界建筑师》使茨威格成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传记作家。弗里顿塔尔在评论这部书时指出，茨威格具有建筑师的眼光。

除了这些作家的传记之外，他在这段时间还写了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约瑟夫·福煦》（1929）、《玛丽·安东内特》（1932），以及稍后创作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1934）等。在这些传记里，茨威格一方面遵循自己所确定的写作原则，“精练、浓缩和准确”；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他关注和追求的不是历史进程的发展和规律性的东西，激起他兴趣的是一连串隐藏有心灵秘密的事件，他要呈现给读者的是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画像，精神肖像。他观察的不是人物的外观，而是要竭力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看重的是围绕他们的也许是琐细但却是富有刺激性的偶然事件。他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由12篇历史人物故事组成的集子《命运攸关的时刻》一书的前言中有一段非常形象的话：“无比丰富的

事件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如整个太空的电聚集于避雷针的尖端。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性的一瞬间……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全人类的命运。”这既可看做是他传记创作的一个特点，也可看做是他对自己的历史观的一种表述。毫无疑问，这种历史观是可以与之争论的，但是茨威格以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解和独特的表现方法，为他在传记文学中赢得了—个独特的地位。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如果说，在这些历史人物传记中，受历史人物本身和历史事件的左右，茨威格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灵魂猎者的本事，那么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小说，特别是在“链条小说”的第二本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和第三本小说集《情感的迷惘》(1927)中，就淋漓尽致地施展了他的才能。这部“链条小说”的第一本《初次经历》是写人的儿童期，第二本是写人的成年期，第三本则多半是写人的老年期，它们构成了人一生的链条。《初次经历》写的是情欲，但不是儿童的情欲，而是通过青春萌发期儿童的眼睛来看被情欲所左右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灼人的秘密”。第二本小说集收有《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它们展示的是由情欲所控制的成年男女的心态，它们在潜意识的驱使下犯下了所谓的“激情之罪”。第三本小说集包括《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六个短篇，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作者极为细腻地描绘了这些人物在情欲的驱逼或意外打击时心灵的震颤和意识的流动。用茨威格自己的话来说，是带有精神分析印记的，探索个人的，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联结的经历。毫无疑问，在二三十年代，他特别热衷心理分析是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分不开的。除了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茨威格是最早承认弗洛伊德学说的德语作家中的一个。谜一样的心理事物对他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支配力量，如他在—篇前言中所说的，“它们激起我极力去追踪它们的联系，那些

奇奇怪怪的人，仅他们在场就燃起一种去认识他们的愿望。”他甚至称，“他的固有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

人的心灵和精神是一个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学家一直为揭示这个世界的秘密而不断地探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世纪交替时期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在这一领域里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且很快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潮，影响遍及许多学术领域，以文学而论，弗洛伊德主义已成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伟大的无所畏惧的心理学家为许多作家打开了进入这一隐秘起来的世界之路。茨威格在谈及此时说道：“在我们总是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我们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灯。”

茨威格是比弗洛伊德稍晚一些的同时代人，他们自一九一一年起就一直有着很好的友谊，他曾多次拜访过这位勇敢的学者；一九二五年他把《与魔的搏斗》一书题献给这位他尊敬的精神病学家；一九三一年他出版的《通过精神进行治疗》一书中，其中一篇就是论述弗洛伊德的。无论是对弗洛伊德的人格，还是对他的学说，他都怀着赞扬和敬重。在谈到人品时他写道：“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这个时代又一次有了榜样，在地球上除了智者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勇气之外，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人的勇气，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发现它，或者不敢说出来，不敢去承认。但是他有胆量，敢于一再地孤身一人去反对众人，敢于闯入从没有人踏进的领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人类永远追求知识的战争中，他的这种精神上的勇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论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意义时，他满怀激情地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这是一个人作出的了不起的事业——我是说更清楚，而不是更幸福，他向整个一代人深化了世界的图像，我说是深化而不是美化……科学的使命是教育人在我们这个坚硬的地球上走直路，走正确的路。弗洛伊德在这项绝对必要的工作上做了他堪称楷模的那一部分工作；在他的著作中，他的努力成为力量，他的严谨成为不可动

摇的法则。弗洛伊德从来不是为了安慰人而向他人指出一条快乐之路，一种进入人世的或上界的天堂的遁逃，而永远只是一条进入自身之路，一条深入自身深处的危险之路。他的观点无所顾忌，他的思维方式一点不会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像凛冽犀利的北风一样，它侵入一片沉闷的氛围，吹散情感中大量的金黄色迷雾和玫瑰色浓云，于是一种进入精神的前景清晰地出现在澄明的地平线上。由于他的贡献，新一代能用另一种目光，更自由、更清楚、更实在地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在茨威格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在这两部小说集中，明显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影响，形象地表现了情欲的力量和无意识的驱动力。《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男主人公仅是由于瞬间的冲动而不惜最后以生命殉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一个十三岁少女对一个登徒子一见倾心，竟像妓女般地委身，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一个出身名门、年逾不惑的孀居女人，竟然为了一个年轻赌徒的一双手神魂颠倒，最后以身相许，甚至想到与他远走天涯；《情感的迷惘》中一个享有声望的莎士比亚学者，是一个同性恋者，为情欲所逼竟偷偷出没在下流龌龊的场所，最后导致身败名裂。茨威格在这些作品中，细腻地表现了主宰人的激情——情欲，描述了受无意识驱使的人的心态和意识的流程。正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明显可见的弗洛伊德的影响，当时有的批评家讥讽茨威格的小说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庸俗化，这种说法失之于偏颇。茨威格不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追随者，他决不是在用小说图解这一学说，他想到的是用一种新的目光去窥视人的心灵世界，去塑造人物的形象。弗洛伊德本人在《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一文中，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看了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当着茨威格的面，他用精神分析学说来解释这篇作品：小说建立在青春期的幻想上，这种幻想体现了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应亲自使他懂得性生活，免得他受到手淫引起的伤害，赌博就是手淫的隐喻。茨威格对此激烈表示反对，弗洛伊德转述茨威格的话：“他向我保证，我对

他所作的解释,跟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有意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条线索。”

茨威格小说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所塑造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本身就驳斥了所谓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庸俗化的批评。但是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学说对他创作的影响和随之带来的一些弱点:这些描写情欲力量和无意识的驱动力的作品,一方面由于过多的、不厌其烦的内心描写而使作品显得臃肿、拖沓;茨威格本人也意识到这点,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总是责怪自己心理描写太多。”另一方面情欲和无意识的题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性;而当他把视野转向现实生活时,他创作的一些作品,如《看不见的收藏》、《桎梏》、《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旧书商门德尔》、《巧识新艺》等就有了更为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更为尖锐的现实意义。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上台中断了茨威格创作生涯的鼎盛时期,他被抛进另一种生活。

德国法西斯攫取了政权,可这对奥地利人的茨威格却是又一次“地震”,一次更为强烈的“地震”,它很快就使他成为一个无家无国的流亡者。

一九一六年,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买了幢房屋。他和他的一个崇拜者,已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的女作家弗里德利克·封·温德尼茨(1882—1971)自一九一六年结识并成为知己;他在地与前夫离婚之后,一九二〇年和她结为伉俪。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三年这段时间,他们在萨尔茨堡度过了一段安宁的幸福时光。他时而出国旅行——这是他的一大乐趣——时而在家里接待朋友,在这些人中间有罗曼·罗兰、托马斯·曼、雅·瓦瑟曼、H.G. 威尔士、胡·霍夫曼斯塔尔、詹·乔伊斯、E.路德维希、乔·勃兰兑斯、P. 瓦莱里、阿·施尼茨勒、弗·韦尔弗、拉威尔、里·施特劳斯、巴尔托克、布·瓦尔特等人。每当他回忆起这段时光,如他在《昨天的世界》中所说的,都是怀着感激的心情。

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也打碎了身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的平静生活。作为一个出身犹太种族的作家,被当做是“一个颓废的堕落时代的代表”,他的书在德国被投入火堆,他的住宅被查抄,说是窝藏枪支。他决定出国一段时间旅行,一九三三年十月他离开经营近二十年的故居,这竟然是一种诀别。在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这八年时光中,他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伦敦居住了一个时期,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去美国、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地,而自奥地利被吞并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无国之人;他现在不得不时时申请,为许可证、签证而奔波,而劳力伤神,而感到人格受辱,而心情沮丧。在《昨天的世界》里他哀叹道:“在最近十年里,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小女官员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在另一处他感伤地写道:“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得多。”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茨威格已从伦敦移居到苏格兰的巴思。现在,他从一个无国籍的人又降格为敌对的外国人,就是因此,他的结婚登记被拖延了——一九三三年他在伦敦时,他的妻子弗里德利克为他找到了一个流亡的犹太少女夏洛特·阿尔特曼做他的秘书。在随后的年代,他与阿尔特曼感情日增,而弗里德利克经常与自己的女儿在异地生活。他们一九三七年分居,最终导致两人友好地分手,一九三八年正式离婚。经过不少周折,他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在一九四〇年得到了批准,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同妻子在美国和南美等地做讲演旅行,参加国际笔会举行的活动。在这段时期,尽管他没有参加流亡组织,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活动,但他利用一切机会,用自己的影响,用自己的财力去帮助、去援救处境困难的流亡者。弗·韦尔夫在当时写道:“没有第二个作家像他那样如此慷慨和大方地帮助他的同行。”一九四〇年他在阿根廷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要为他举行宴会,他感谢给予他的这种荣誉,但表示最好用给德国流亡者的

签证来代替。他把减轻流亡者的痛苦,为他们尽自己的微力看做是自己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在此之前不久,他在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中用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我的一半时间都用来为大洋彼岸办理宣誓书、许可证和筹措旅行费用,我怕您想像不出这有多么困难,多么费力。我们这些逃脱了彼岸盖世太保的人把这当做是首要的义务,其他一切相比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在茨威格生活的最后八九年,虽然他过着一种犹如飘蓬般的流亡生涯,可他依然勤奋地写作。希特勒的暴政和发动的残酷战争使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祖国,使他的种族陷入灭绝境地,这必然为他的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主题,新的思考,也必然要在他的著作中反映出来。最能表明他思想的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以尼德兰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写成的传记《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以及一九三六年同样以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为背景的传记《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这两本传记有着共同的主旨,即是崇尚宽容,反对狂热;推崇和谐,反对极端;尊崇良知,反对暴力。他选择了这两位中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历史人物,这表明他们对他们思想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亲缘关系,是通过他们对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一种表态,如有的评论家称,这是“一种遮掩起来的自我描述”。无论是《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还是《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它们对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的颂扬,对思想统治和政治暴力的鞭笞都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他要把历史当做是对现今时代的一种警告来加以理解。但它们也表明了茨威格思想上的弱点,他缺少更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现实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伊拉斯谟的身上,他寻求的不是去激起对暴虐者的仇恨,去鼓舞被迫害者的战斗热情,而是致力于去理解、去沟通,越是在一个狂热的时代越要采取一种超党派的立场。这里不能不提到他在希特勒上台前写的一篇题为《对缓慢的反叛》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把法西斯的崛起看做是“青年人的一种也许是不聪明的,但在最内在意义上却是自然的和完全肯定的对‘高层’政治的反叛”。

克劳斯·曼对此曾著文，题为《青年人和激烈主义》加以批评；虽然茨威格很快对自己的这种错误有了悔悟，但这两本传记著作依然表明了茨威格思想上的弱点。

除了一些传记之外，《心灵的焦躁》(1936)是他这个时期的一部，也是他唯一一部完成了的长篇小说。它写了一个青年军官出于同情而搅入一个富有的瘫痪的犹太少女的感情生活，最终酿成了一场悲剧。小说运用大量的意识流手法细腻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虽然完全是虚构的，缺少生活的真实，但有着强烈的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它表达了作者对法西斯暴政的憎恨和精神对恐怖的胜利。像茨威格的大多数小说一样，这两部作品也分别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六〇年被搬上了银幕。

茨威格本人并没有等到他的《象棋的故事》的出版，同样也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他的自传《昨天的世界》的问世。他是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他不愿再经历，再熬过第二场世界战争。他相信曙光的必然到来，可却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这个“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沉重的日子里，匆忙地没有完成他的两卷本的《巴尔扎克》和已着手写的《蒙田传》，就与妻子一道辞世而去，留下那封悲怆感人的绝命书。

茨威格的自杀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和震惊，巴西为他举行了国葬，送葬的队伍中有巴西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以及普通的市民。他被安葬在巴西国王彼德罗二世的陵墓之侧。在一部世界文学史上，难得有一个流亡异国的作家死时享有如此的殊荣。在洛杉矶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上，弗·韦尔弗发表了讲话，他说：“茨威格名满天下。他同很少的人享有举世瞩目的声誉，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像他所获得广泛的和持久的成功那样尽人皆知。”茨威格一生著有十二部传记，九部散文集，七部戏剧，六本小说集，两部长篇（一部未完成）以及一部题为《昨天的世界》的自传。这些作品确保了他在

德语文学中的地位,也为他在世界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多年来他一直是人们所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他把整个世界当做他的故国,他的书也在地球上所有的语言中找到了友谊和接受。

这部选集在篇目的选择和安排上,限于编者的水平,遗漏、不当之处难免,尚希读者指正。编者在这里向这本选集的所有译者表示感谢,还要感谢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章祖德、赵燮生两位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策划和支持,这部选集的问世才成为可能。茨威格已是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家了,愿这部选集能对读者进一步理解茨威格及其作品,在提高审美情趣上有所裨益。如能这样,我想不仅编者,就是译者和出版者都会感到欣慰的。

高中甫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二日